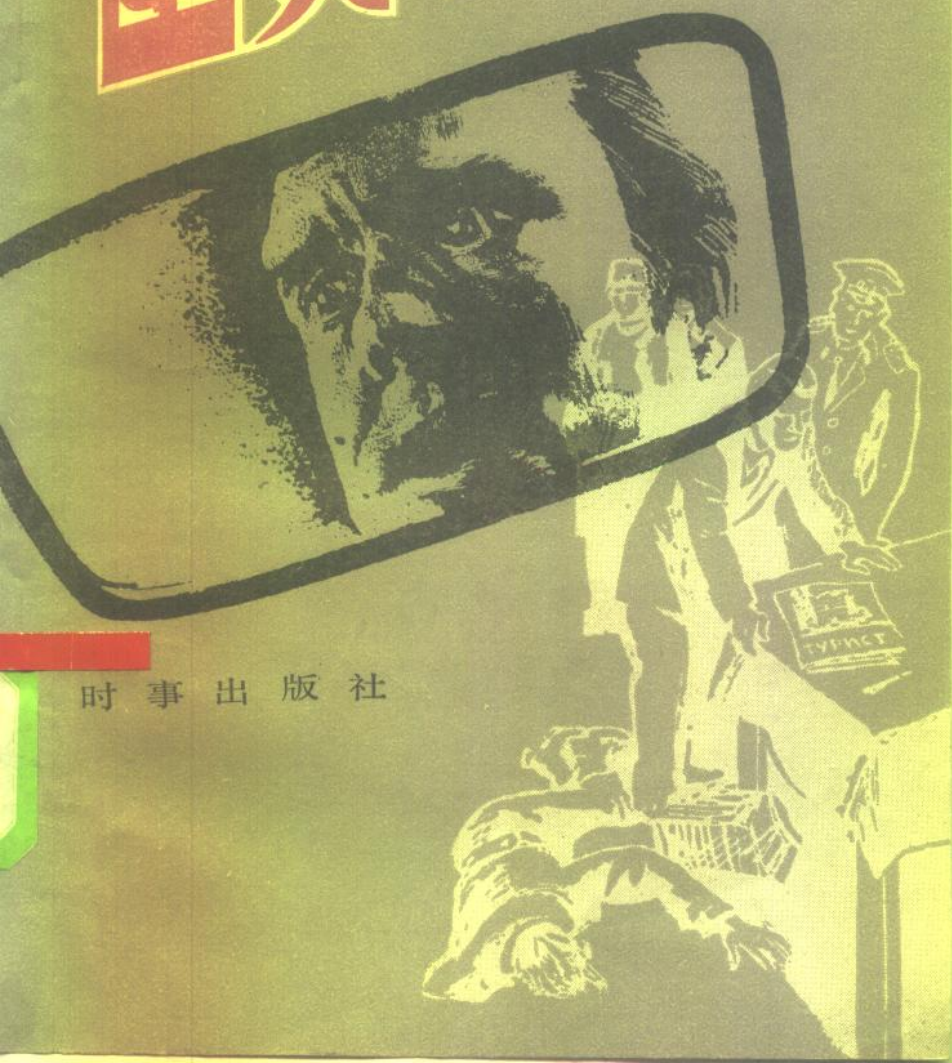


“幽灵”的踪迹



时事出版社

“幽灵”的踪迹

——苏联刑事案例选

雷 正选译



时事出版社

1985年

“幽灵”的踪迹
——苏联刑事案例选

雷正编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涿县范阳印刷厂排版
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191,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2,000

统一书号: 10225·012 社科新书目: 123-111

定价: 1.25元

前言

60667/17

本书的二十三个刑事案例，是从苏联最高检察院主办的《社会主义法制》杂志1970至1984年刊登的数百个案例中选出来的。这些案例都是真实的。该杂志在发表时仅对某些姓名、地点作了更改。

目 录

两把一模一样的刀子·····	(1)
白桦林中的枪声·····	(32)
奇怪的遗书·····	(42)
最后一次表演·····	(47)
三个红发女人·····	(61)
三天·····	(73)
远方来的客人·····	(80)
奇特的自供·····	(88)
死而复生的人·····	(122)
邮袋·····	(137)
一根桑树枝·····	(143)
不说话的证人·····	(153)
两个案件的秘密·····	(164)
三个谜·····	(172)
“幽灵”的踪迹·····	(179)
究竟谁在诬告·····	(188)
报纸做的瓶塞·····	(204)
飞来的石头·····	(217)
案卷中没有的证据·····	(223)
划过的火柴·····	(234)
“演员”·····	(240)
“不在现场”·····	(252)
神秘的箱子·····	(256)

两把一模一样的刀子

A·别茹格洛夫

我奉命调到佐梁斯克，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这是一个不大的城市，象这样的城市在俄罗斯中部并不罕见。

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熟悉一下新的工作环境，检察长兹万采夫就把我找了去，并对我说：

“扎哈尔·彼得罗维奇，我要到州检察院去，您留在这里代理我的职务。”他又叹了口气说：“都快退休的人了，还要派去学习，一学就是两个月。看来，您对这里的情况已经有了初步了解，是吗？”

“是的，大体上有了些了解。”我回答道。

兹万采夫对我作了一些“原则性的指示”，便要我参加一件凶杀案的审理工作，该案本来是应该由他亲自审理的。

检察长一走，我便立即着手研究案情，离开庭只剩下两天了。

情况是这样的：五月二十日清晨，佐梁斯克建筑技术学校的两位学生，德米特里·克拉斯诺夫和伊万·赫罗莫夫到当地的蓝湖水库去游玩。他们带了鱼竿、食品和酒。就是这酒导致了一场悲剧。

调查材料称：两个朋友起先一起钓了鱼，后来在小树林

里点起了篝火，足足喝了一瓶伏特加和一瓶葡萄酒。克拉斯诺夫开始取笑赫罗莫夫，叫他“公鹅”（这是指赫罗莫夫小时候因遭车祸而致残的胸部）。

赫罗莫夫抓起刀子向克拉斯诺夫戳去，一共捅了五刀。其中一刀正中心脏，成了致命的一击。这一切发生在傍晚六点左右。

以刑侦处处长日古托夫大尉为首的佐梁斯克民警局行动小组赶到了出事地点。

赫罗莫夫在现场受讯时说，他的同学是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杀死的。但是民警人员对其含糊不清的解释产生了怀疑，便决定将他拘留起来。日古托夫在民警局对赫罗莫夫继续进行审讯，赫罗莫夫最终供认，他就是凶手。

一天后，检察院的侦查员罗日科夫斯基着手处理此案。初审时，赫罗莫夫的供词与以前没有两样。

技术学校的教师在调查材料中指出，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赫罗莫夫一直回避与同班同学交往。他生性孤僻，对任何触及自己残疾的话语都十分敏感。同班同学认为，赫罗莫夫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性情暴躁的人。

应技术学校校长的请求，民警局安排他与赫罗莫夫见了面。见面时日古托夫也在场。校长打算象慈父一样和小伙子来一次促膝谈心，弄清事情的缘由。但是赫罗莫夫以粗鲁的、令人难堪的语言回报了校长的好意……

开庭时，我坐在国家公诉人席上。赫罗莫夫的辩护人别洛波利斯基坐在我的对面。

大厅里挤满了技术学校的学生，他们都是一些头发蓬乱、衣着随便的半大孩子。法庭里很快安静了下来。前面一

排长凳上坐着四个满面愁容的人——死者的父母、赫罗莫夫的母亲和哥哥。

被告被带了进来。小伙子个子不高，穿着外套几乎难以觉察到他胸部的残疾。

审判官开始入席。孔德拉金担任主席，他那银白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还有两位女陪审员，一位年纪大些，另一位还很年轻。

履行完规定的程序，法庭开始审问被告。

赫罗莫夫在陈述发案经过时，两眼看着地板，就象一个被学习弄得疲惫不堪的学生在背诵令人发腻的功课一样。然后，辩护律师用了很长时间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悲剧发生前双方谈话的内容，以及争吵时各自所处的位置。可是辩护律师更感兴趣的是，被告究竟把凶器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赫罗莫夫在预审时说，他把刀子扔在了篝火旁。在另一次审讯时又说，刀子丢了。至于在什么地方丢的，已经记不清了。尽管民警同志用吸铁石和金属探索器搜遍了蓝湖公园的每个角落，这把刀始终没有找到。

日古托夫大尉审讯赫罗莫夫时，被告供认，去水库时随身带了一把刀子，那是他当钳工的哥哥亲手做的。在赫罗莫夫家搜查到了另一把刀。他的哥哥承认，这种刀子共有两把，外形一模一样，兄弟俩一人一把。而且做刀子用的合金钢材也是从同一块料上取下的。

从赫罗莫夫家搜出的这把刀作为物证归入案卷。刀长十三厘米。

“您五月二十号带到水库去的那把刀早就有了吗？”律师别洛波利斯基向自己的被辩护人问道。

“三年了。”赫罗莫夫答。

“您用它干什么来了？”

“削东西，做鱼竿。一般来说……”

“刀子从来没有折断过吗？”

赫罗莫夫沉默了一会：

“有一次刀尖被折断过，我请哥哥给磨了磨。”

“折断了很多吗？”

“两厘米左右。”

赫罗莫夫的哥哥证实，的确有过这么回事。

“您磨这把刀时，刀身比以前短了多少？”

“短了二十到二十五毫米。”证人答道。

法庭开始询问医学鉴定专家赫雷斯托娃。

辩护律师问：“用来杀死克拉斯诺夫的刀子必须有多长？”

“十三厘米。”

“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我的被辩护人的刀子截短了两厘米，那么它就不可能充当杀人凶器？”别洛波利斯基把问题挑得更明确了一些。

“我说过了，”赫雷斯托娃重复道，“被害人是被人用十三厘米长的凶器杀死的。”

别洛波利斯基根据这一重要论据，要求对本案进行补充侦查。

孔德拉金低声和陪审员交换了一下意见。

“公诉人对辩护律师的请求有什么看法？”主持人转身向我问道。

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我也来不

及好好掂量一下，支持辩护律师的请求会引起什么反响。

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

大厅里传来了人们轻轻的交谈声和咳嗽声。

我发现别洛波利斯基正以一种惊奇的、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我。当审判官们在会议室进行合议时，我一直在想：“兹万采夫检察长对这个问题会怎么看呢？起诉书的控诉意见可是他批准的啊！”可是事情确实有点不那么简单……

主席宣布：“法庭裁决，对本案进行补充侦查。”

这时我想起了检察长的临别赠言：“要尽量避免冲突。”这算是第一个冲突吧！……

这场冲突可真非同小可。区民警局局长索科洛夫打来电话，明确表示不赞成我的举动。他特别着重指出，日古托夫在破获这起谋杀案中，起了重大作用。

关于刑侦处处长的为人，我已经听说了。他机智超群，勇敢善战。最近他侦破了好几起复杂的案件，并亲自参加了追捕一名携带武器的危险罪犯，为此他获得了奖赏。

“您要知道，您将为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索科洛夫问。

“我知道。”我平静地回答说。

“您和兹万采夫同志商量过没有？”民警局长感兴趣地问。

“我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我已经带着几分挑战的语气回答道。

“啊呀呀！扎哈尔·彼得罗维奇，您可真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这次毫无结果的谈话就在这种客气而又冷淡的气氛中结

束了。他使我感到莫明其妙。我真没有想到，区民警局长可以用这样的口吻和区检查长谈话（尽管我是代理检察长），不管怎样，在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检察长的威信是无可争议的。

案子退了回来。我把侦查员罗日科夫斯基和日古托夫大尉找了来，向他们传达了法院的决定。

“是这么回事，同志们，”我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侦查过程中的错误。”

然而，要做到平心静气真是谈何容易！日古托夫听后立即火冒三丈。他说：

“我们干嘛要迁就这个……”大尉的话没有说完，看见我的责备的眼光便改口道：“干嘛要迁就这位律师？您瞧，他是从州里来的，一来就把大家的脑袋都搞糊涂了。”

侦查员罗日科夫斯基表示支持日古托夫的看法，他说：“扎哈尔·彼得罗维奇，您得承认，这位律师可真够机灵的，一下子抓住了刀子这张王牌！”

“你们这是咎由自取！”我回敬了一句。

“该做的我都做了。”罗日科夫斯基生气地说。“某些地方甚至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我询问了那么多人，可以说，把罪犯的老底全兜出来了。”

“可是偏偏在杀人凶器这个最主要的证据上卡了壳！”我一针见血地指出。“竟然用另一把刀子来充当物证，现在只好被动挨打。”

“对不起，对不起！”罗日科夫斯基抗议说。他拿出案件卷宗，找出了一页纸。“被告赫罗莫夫的哥哥作证说，他做了两把完全一模一样的刀子。我再说一遍：完全一模一

样！而且是用同一块钢材制成的。”

“而所谓的‘刀子被截断过’，‘短了两厘米’，这都是律师的想象。”日古托夫插了一句。

“如果不是他的想象呢？”我反问道。

“为什么赫罗莫夫早一些时候没有想起这一点呢？”大尉说。

“是啊！”罗日科夫斯基急忙附和道。“被告一次也没有提到刀子被截断过，他是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些事的。”

“你们问过他没有？”我说。

“我脑子里压根儿没有想到过。他以往如何摆弄这把刀子，这并不重要，并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扎哈尔·彼得罗维奇，请您相信，假如刀子真的折断过，赫罗莫夫是会向侦查员讲的。他是个大小伙子了，什么事都清楚。”侦查员说。

“就是说，您也……”

“我支持大尉的意见。可我甚至还挺喜欢这位别洛波利斯基律师。”他面带笑容看了日古托夫一眼。“我和日古托夫同志不同的是，我尊重那些机灵的人……不过，您，扎哈尔·彼得罗维奇，当时并不是没有可能驳倒辩护律师的论点的。”侦查员把手放在卷宗上说：“证据就在这里……”

“遗憾的是，这里面除了刀子问题外，还有不少矛盾之处。”我回答说。

罗日科夫斯基的脸沉了下来。

我打开卷宗接着说：“就拿被告和死者发生争吵一事来说吧，赫罗莫夫最初的供词是：‘我用刀刺进他的腰部，克拉斯诺夫叫了起来，骂了一句：你这个坏蛋！’而在另一处，”我翻到另一页念道：“‘我用刀刺进了克拉斯诺夫的肚

子，他说：万卡，你这个下流胚！’还有，被告在这里说，他用刀子对准克拉斯诺夫，后者跪了下来；可另一个地方被告又说，克拉斯诺夫慌忙往后退，而赫罗莫夫还是用刀子捅了他。”

“这有什么矛盾呢？”罗日科夫斯基勉强克制住自己的不满说。“赫罗莫夫处在激动之中，一些细节记不清了。”

“他在审讯时情绪并不激动，”我反驳道。“这些细节他谈得十分清楚，可是为什么会前后矛盾呢？”

“可您知道，”侦查员两手一摊说，“我们这里又不是药房！”

“然而，这里也应该象药房一样的一丝不苟。”我说。接着我问日古托夫：“怎么搞的？为什么不通知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去勘查现场？”

“我们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大尉回答说。

“格兰斯卡娅（我们的另一位侦查员）值班，”罗日科

夫斯基解释说，“当时她被叫去处理另一个案件去了，而我又不在家……”

后来我作出了一项硬性规定：每一个需要检察人员到场的案件，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都要让我知道。只要我不离开



本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都会知道我的行踪。

谈话还没有结束。罗日科夫斯基接着说：“我相信，补充侦查不会有任何结果。这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我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您也知道，抢劫供应站的案子有多棘手……”

“照我看，您带着这种情绪还是不要再插手赫罗莫夫案件为好。”我说。

“您打算交给别人处理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的，这是我的权力，现在我要使用一下这个权力……”

我把补充侦查的任务交给了格兰斯卡娅。她刚和赫罗莫夫接触了一次，便十分激动地来找我。她说：

“扎哈尔·彼得罗维奇，我简直没法理解，赫罗莫夫不愿意同我谈话。”

格兰斯卡娅长得很美。有人开玩笑地称她为“检察小姐”。她穿着朴素，但很有魅力。当她穿上制服的时候，就越发美丽动人。看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乐意和她攀谈。因此我不胜惊讶地问：

“他拒绝了吗？”

“他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何必还要多费口舌呢？你们最好快点给我判刑，别再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了……”

“也许，他在掩护一个什么人？”我向她谈了我的想法。

“不排除这种可能。”

“好吧，我们不妨试试一起讯问吧！”

赫罗莫夫带着戒备的神情走进了审讯室。当他看到不止是格兰斯卡娅一个人在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坐吧，赫罗莫夫！”女侦查员说。“您在法庭上已经见到过扎哈尔·彼得罗维奇了……您知道吗？检察长和我认为，某些细节还没有弄清楚，假如一切都已很清楚了，那就用不着再坐在这里和您谈心了。”

她用这样一种严肃而又充满信任的语气和被告交谈，这使我感到非常满意。

赫罗莫夫坐了下来。起初，我们问了他一些离题较远的问题，如：他是怎样和克拉斯诺夫交上朋友的？他们过去又是怎样成为莫逆之交的……等等。从他那极为简短的回答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小伙子显得很拘谨。当格兰斯卡娅把话转到主要问题——蓝湖事件上来时，赫罗莫夫开始不安起来。

“那有什么可说的？”他就象在法庭上那样，两眼盯着地板说。“季马（克拉斯诺夫的爱称）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一想到他的父母，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啊，他们的心情很沉重，赫罗莫夫。”格兰斯卡娅点了点头。“何况他们想到，自己的儿子是被他的朋友杀死的……”

赫罗莫夫无言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得出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您有什么话没有讲出来。”我加入了这场谈话。“季马的父母象对待自己亲生儿子那样对待您，他们一定也很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我想见见他们。”赫罗莫夫抬起头来望着我说。“我想向他们解释一下。可是日古托夫说，季马的父亲会把我撕成碎块的。”

“事实并非如此！”格兰斯卡娅说。她在卷宗里找出了

不久前询问克拉斯诺夫父亲的记录，他说他不相信赫罗莫夫有罪，并请求和赫罗莫夫当面对证。

赫罗莫夫看了记录，不知所措地把目光从格兰斯卡娅的身上转到我的脸上。

“可为什么大尉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呢？”赫罗莫夫绝望地说。“为什么？如果我早知道的话！就是说，我也欺骗了他们……”

“您什么地方欺骗了他们？”格兰斯卡娅问。“季马不是我杀的！请你们相信我，我没有杀死他！”

“好吧，赫罗莫夫，您安静一下。您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都说，”赫罗莫夫着急地说。“不过，请你们相信我……事情发生在晚上六点左右。我们在那里钓的都是些什么鱼啊！全是些红眼鱼！”他用手比画着。“只有几条斜齿鳊鱼。我们在湖边冻得够呛，便到小树林去，点起了篝火。喝了两瓶酒。我喜欢拨弄火，就爬到树上去摘干树枝。季马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碰到一根很硬的树枝，想弄断它，差一点没有栽到地上来。突然，我听到季马在和什么人吵架。往下一看，他正和一个男人争论着什么。我开始往下爬，我折断的那根树枝又被别的树枝挂住了。我跳了下来，只见季马捂住肚子和胸口，对我喊着：‘万尼亚，他用



刀捅了我！’鲜血沿着他的手和大腿直往下流……我扑向季马，想扶住他，但他还是倒了下去。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溜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东奔西闯，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这时我跳上一条小道，正巧迎面有几个人走了过来。我喊了起来：‘我的朋友被人杀死了！’接下去就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记得有一位姑娘在旁边安慰我，让我安静下来。后来民警就赶来了……”

“您能不能说一说，那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格兰斯卡娅问道。

“我没有仔细看他。只记得他留着大胡子，好象穿着条马裤，是一个上年纪的人。就这些。”

“为什么您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侦查员，而且在法庭上也不吭声呢？”我用温和而又带有责备的口吻说。

“我向日古托夫大尉说过，可他不相信。和我一起关在拘留所里的一个姓科列斯尼克的人劝我，不要拖延时间，还是早点承认为好。我想，既然如此，何必再拖时间呢？与其在拘留所里成天被人审问来审问去，倒不如一头扎进劳改营……”

第二天，格兰斯卡娅又详细讯问了赫罗莫夫一些问题，然后会见了克拉斯诺夫的双亲以及被告的母亲和哥哥。

出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由于发生了口角，赫罗莫夫一气之下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另一种可能是：克拉斯诺夫是被一个穿着马裤、留着大胡子的陌生人杀死的。

格兰斯卡娅把她拟订的侦查计划拿来征求我的意见。计划包括：询问民警局的工作人员和参加勘查现场的见证人；核对与此案有关的全部文件；询问五月二十日在醒酒所里被